

人的感性解放与精神发展

齐鹏

人的感觉解放、感性革命和全面发展成为全球化的21世纪思考的中心。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这一论断对全球视野中人的感性解放和精神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纵观人类文明史，世界历史的发展无非是体现于感性与理性内在系统结构的辩证的矛盾运动。感性与理性既是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又是构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二者的建构、整合和内在适度的张力，是人的生命精神、智性、人文精神的基础，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上往往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忽视感性的作用，从而造成“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和“理性的暴政”（席勒语）。在全球化时代，科技理性对人的感性和生命精神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导致新的“人文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在这种形势下，呼唤人文精神、重建精神家园便凸显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主题。

一、感性与人的本质

历史上往往过多地强调理性的作用，而忽视感性问题，事实上感性与理性是一个整合的关系。感性既是理性形成的基础，又对理性的高级形态有纠正作用。感性问题在理论上提出之初，即是人类自身认识深化的标志。感性和理性在人的精神史上的关系常反映出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的自由程度。

人的生命本身是感性的存在。人是肉体的、情欲的、有生命力的、现实的、感性的和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对象是作为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马克思，第124页）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然性的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二重性：人既是自我意识，又是对象意识；既有人性，又有自然属性；既是主动的，又是受动的。“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人是“能动的”、有生命力的，这是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类改造自然与世界的内在驱动力。作为感性对象的存在物，人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肉体的、感性的，这是人类不得不依赖和受制于自然界的内在原因。就感性本身而言，它不是人的本质；感性的对象性才是人的本质，是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感性与人的本质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感觉是一个人所具备的心理机能，它的显著特点是非理性的、非线性的和非系统性的，它们多表现为感性的、直觉的、梦幻的、心灵感应的、超前认知的、预感的等等方面。人的本质是希望自我感觉的所有满足，比如，行为上的自由自在，思维上的不着边际的想象，精神境界上的升华，成果上的创造性的体现等等。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对应的。另一方面，感性展示人的感性生命生存的矛盾性，隐含人的“内心梦幻”，唤起人类内心隐藏的神秘性，暗示着人的一种心理机能。格式塔心理学表明，感觉是一个人所具备的认知模式和心理机能。感觉对心理机能的影响力，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感觉过程和进化过程是不断地寻找生活真谛和探索真理的过程，是不断提升人的生命精神高度的过程。

人的行为、观念和认识都是从感觉开始的。感觉是人反映周围环境信息的最初因素，是一切知识的源泉，是人改造世界的开端。列宁曾说过，除了经过感觉，我们既不能知道任何物质形态，也不能知道任何运动形态。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把感觉的解放和感性的革命看作是实践的、历史的和人的解放问题。他精辟而又深刻地指出：“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7页）。

二、科技革命导致人的感性解放和人格整合

全球化是由于新科学技术革命为人类提供了新型生产力，即提供了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化、自动化、信息化、电子化的高技术生产力，而人是新型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因素的背后是人的感性解放和人的智能革命。

第一，全球化的科技革命导致了“人工智能革命”。它不仅能延伸人的各种感觉器官，而且能改变人的智能。换言之，研究人的智能导致人工智能革命，同时，研究人工智能又推动人的感性解放和智能革命。

从仿生学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就是通过对人脑的“结构模拟”来达到人的感觉能力。神经网络本身具有很强的思考和语言能力，再加上它模拟人脑的形象思维，达到了人脑的感知功能。哈弗尔德根据人脑结构和工作原理提出神经网络模型，采用数值计算的方法，在微观上模拟人脑的一切感知活动。由于大脑的微电板记录技术以及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的出现，为同步记录大脑的微观和宏观活动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日本RWC的筑波研究中心制定了“适应进化计算机”的研究计划，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要实现更接近人的计算机和智能：将这种计算机置于模糊的、经常变化的、难以预测的环境中，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自行重组，使程序与体系结构进化，以适应外界环境，并作出恰当的判断和处理。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就是“功能模拟和符号推演”。按心理学途径研究人工智能，就是运用实验心理的方法，搜集和

考察人在各种情境下解决各类问题时的言语素材和行为表现。然后，对这些实验材料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试图了解掌握的人群（受试者们）在知觉、记忆、理解或解决各种问题时有何反应，有什么样的生理和心理感觉，如何推演，如何进行模式识别，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捷径等等。在总结出一些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心理模型，然后用计算机进行模式识别和功能模拟。这是从宏观知识论的角度来模拟人脑的感觉和思维，实现机器智能。从一定意义上说，模式识别就是主体对客体进行感性认识的过程。当对象（模式）的感觉特征与感知主体认识结构中先前获得的有关知识相匹配时，这个对象模式就被识别了，主体对客体的感性形态的观念把握就相对完成了。

从计算机的工程技术设计意义上看人工智能与人的感性。无论是“结构模拟和神经计算机”从微观上模拟人脑，还是“功能模拟和符号推演”从宏观上模拟人脑，都得具有“符号操作系统”输入符号、输出符号、存储符号、复制符号、建立符号结构和条件性转移等6种功能的完善的信息加工系统，更离不开人的智能，并且这一操作系统的关键是人的感觉能力、生理反应和心理机能的整合。

第二，全球化的“数字化革命”导致了人的感性解放和人格整合。

首先，计算机的三维技术、模拟技术、人/机界面技术和虚拟技术导致感性解放。它本身延伸了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器官，超越了传统的感觉方式、感觉对象、感受性和感觉经验，打破了现实性与虚拟性的时空界限，导致了传统的自然平台上“不存在”和“不可能”的感性解放和心理整合。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对整个心理和社会的复合体都产生影响。”（麦克卢汉，第21页）数字化作为媒介的一种特殊构成方式，对人的感性的影响力更是不可估量。

其次，全球化的数字化革命拓展了人类的感性空间。陈志良说，数字化的虚拟使人类真正地拥有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虚拟世界。也就是说，人类也真正地拥有了两个产生感性的平台：一个是现实的、直接的、感觉对象的自然平台，一个是虚拟的人/机互为感性对象的数字化虚拟平台。这种现实与虚拟的交互作用大大拓展了人的感性维度，导致人的感性解放。比如在传统平台上，人们的实践活动通常受到特定的物理时空的限制。形容古人的感受性、想象力和神思不受时空限制的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实际上只是一种想象，不能成为现实，但现在在数字化的虚拟平台上，这些都可以成为一种虚拟的现实。另外，数字化的虚拟空间创造了人际交往的全新模式和新平台，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机能的整合产生巨大影响。人们可根据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在虚拟空间中制造新的“自我”，并使之得到人格整合。正如杜超所说：“聊天室、BBC、电子邮件等等，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对缓解用户的紧张心理、释放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压力，的确有其积极的作用。”（杜超）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虚拟现实技术导致人类感性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我们穿上数字化特制服装，戴上数据手套、特制的眼镜和功能齐全的头盔显示器，坐在“观看虚拟世界的窗口”时，我们看到一切都不是现实世界，而是虚拟的神话般的世界。你可以体验上天入海的快感；你可以是领袖，让万人拥戴；你可以与情人约会，像在真的现实世界中一样感受拥抱、亲吻和激动，甚至让人体验到现实生活中只能想象而不能达到的感受。又比如，宇航员杨利伟飞上太空前，更多地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太空的环境，体验在太空中上下翻滚的感受，经过无数次的高强度训练，才最后取得了成功。虚拟现实技术既是人的虚拟实践活动的存在形式，又是人本身的新型存在状态，为人的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塑造着新的自由空间，并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虚拟实践，是人类实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让人体验现实感性所没有的沉浸（Immersion）、交互（Interaction）和想象（Imagination）的人/机感应。

第三，全球化的“生物科学革命”推进了“DNA芯片”的研制成功和基因的破译，这些都将带来一场全面的人类革命，改变人的生理结构、感性方式和人的智能。这意味着不仅可以设计某个人的各种器官，而且能设计整个人类。

基因识别揭开人类最“自然的感性”之谜。基因芯片由若干基因探针构成，每个基因探针包含着由若干核苷酸对组成的DNA片段。根据碱基配对原则捕捉相应的DNA，从而进行基因识别。基因又与人的感性遗传密切相关，因此，基因的识别意味着生物技术的操纵，它直接影响到了人体的生理组织、心理结构、大脑功能、人特有的感觉能力、记忆和基因的未来，也就是影响到人类的最“自然”的感觉本性。

改变DNA感性遗传基因导致感性革命。众所周知，生物的许多特性是由DNA编码决定的，基因是生物存在的化身，储存于其中的丰富遗传基因协调整个人类的感性生命旅程。而DNA芯片研制成功，使人类获得了重要的个人感性基因研究资料。它不仅充分认识基因结构、基因编码、基因表达和基因识别，而且设计DNA，使重组DNA编码和合成DNA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特别是计算机正越来越多地用来破译、管理和组织大量的感性遗传信息，电脑将信息以一种革命性的新方式进行组织，从而成为一种管理基因、细胞、器官、生物和生态圈之间动态流动和相互作用的理想工具。数字化又把信息的DNA，以0和1的形式进行转换，利用高集成度的芯片来存贮，从而实现了DNA信息基因的快速传递和重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遥控显示系统和智能指令，可以扩大大脑皮层运动的感觉和计算的功能，并将其运作语言移植到生物系统中，改变人的感性DNA基因的结构功能，导致感觉解放和感性革命。在未来，基因技术还将可能被用来增强各种智能，例如，缺乏艺术天赋的父母可以物色天生具备超常艺术禀赋的基因，并在产前把这些基因注入孕妇体内。另外一些父母则可能会通过选择基因使他们的孩子获得多方面的感性资质等等。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数字化与生物科学的联姻改变了人的感性方式、生理结构、心理机能和智能，从而导致人类感觉的解放和感性方式的变革。人类越来越多地把电脑、基因和智能当作“换心智”的手段，用它处理、重新调整和组织感性生命世界的浩瀚遗传信息。

三、全球化拓展人的感性发展空间

无论是全球化的“人工智能革命”、“生物科学革命”，还是全球化的“数字化革命”，都与感性有密切的关系。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第一，全球化拓展了人类的感性时空维度。

人的感性发展纳入到全球化时空的轨道时就导致时空的重组，这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文化与科技的时空结构和功能，驱动着全球化的产业结构，代表了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创造着人类感性发展的新平台。数字化和全球化的时空结构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人的全面发展方式。它是以全球开放的眼界对传统的、地域的、民族的、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突破和创新。

时间在今天是一种速度功能，只有按照它的速度或速率本身才能感受到。数字化人/机界面的新空间，不是一个自然平台上感觉的多维空间，不是物体存在的广延性，即长度、宽度和高度这种具有三维性的现实空间，不是用体积去测量的空间，不是历史维度上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异质的，它在多种多样的层面上同时展开。它已经超出单个的人类身体去体验感觉，确定自身位置的能力。它表现为一种广义上的人文时空。一方面，网络全球化的空间概念成为当代集图像、声音、动感为一体的人文成果，它对人文精神的传播、保存、复制使一切文化产品的扩展具有了无限空间的可能性。人文交流跨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地域的阻隔，以融合全球文化的精华；人们的交往在数字化平台上穿越时空地沟通古人与今人、国人与洋人、现在与未来，互相交流信息、思想、情感和知识。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时空又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诸多领域无限空间发展的可能性。事实上，虚拟社会使类存在及其活动的环境具有了多重性和可选择性，是现实实践时空的延伸和升华。

第二，全球化拓展人类感性的组织维度。

感性维度的拓展与感性文化的嵌入程度，与该地区、该国家的基础设施、文化制度、科技水平密切相关。而这种以感性文化设施为基础的文化制度、感性方式和科技水平，则是感性文化全球化的组织维度。

全球化拓展人类感性的组织维度，首先，在于人类在全球范围内被联系、被组织成一个有机系统。全球范围内的人类社会不再是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的集合体，而是成为具有系统性、有机性的整体，全球系统几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各地区、各民族不过是全球系统中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发展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其他地区和国家乃至全球系统的整体状况的影响。其次，在于它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结合起来，把人的智慧才能与各种类型的信息资源与信息化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合理配置与利用，从根本上拓展人类感性的组织维度。

第三，全球化拓展人类感性的结构维度。

人类的感性方式的变革不是单个人、单个地区、单个民族、单个国家的行动，而是全球无数个人、单位、民族、制度在感性方式、文化交流和交往实践中相互间冲突、磨合、整合和累积性互动的结果。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感性方式的转换与变革又类似于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有三个要素，即促使全球“结构化”的感性主体、客体和中介。三要素通过跨民族、跨国界的流动，或者说通过运动的方式，以感性文化全球化交流所占据的时间和传播所覆盖的空间，构成了现实的感性文化全球化的结构维度。全球化人类感性的时空维度、组织维度和结构维度对人的感性解放、精神发展和民族的繁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我国的发展来看，我们以前是感性主客体的对立性思维，缺乏感性思维的维度，不是过分强调民族性发展空间而忽视全球性发展空间，就是过分强调全球性发展空间而忽视民族性发展空间，并常常强调理性发展的重要性而忽视感性发展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偏颇的，其思维方式都还是传统的主客体二元思维。

第四，回归感性是对全球文化扩张的一种抗击。

回归感性生命精神是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达到的一种新的整合。它不是要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抛弃自己的“民族性”，而是在全新文化实践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中，提升民族性（特色），体现“世界性”。全球化视野中人的感性解放和精神发展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它既创造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既令人鼓舞又令人恐惧。当对理性的希望变成对理性的绝望后，感性情绪便会萌发，曾被理性启蒙贬损的感性便会再度复兴起来。从实质上看，这场感性复兴运动与其说是修复破损的感性信仰，还不如说是修复破损的社会：它已变成一场社会文化运动及政治运动，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是因全球化而起的一种逆全球化思潮，是用神话的双脚到记忆的远方去追寻被压抑、被遗忘的共同体想象。

全球化挑战民族国家，削弱民族国家的权威，而全球视野中人的感性解放和精神发展又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一切文化都是某一民族的文化，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文化体现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精神。全球化创造了一种平等的全球文化平台，为文化多元化、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和民族文化综合创新创造了条件，民族文化也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样式，实现新的融合与整合。但是，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推动全球化文化的同时，也推动着文化一元化、文化同质化和霸权化。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的对立、理性文化与感性文化的内在张力构成了全球文化矛盾的“互动”关系。感性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体系，一定会成为这场民主化运动的文化先驱。感性复兴运动是回归感性生命精神，是对全球文化扩张的一种抗拒，是本土化对异邦化的一种反击，是重新确认与强化民族文化认同、重建精神家园的一种努力，也可以说是复兴民族文化、重构民族文化身份、重塑民族个性的一种民族文化运动。

全球化终结了一个安定的时代，而开启了一个风险的时代。尽管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理性为主体、科技发达的世界，而且理性与科技亦曾慷慨地许诺将破译这个世界所有的难题，为人类创造更为安宁、更为幸福的生活，但是，理性与科技一方面许诺，另一方面也在实现着自己的报应：它们制造了这些全球性问题，把人类推上了风险之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感性开始了它的再度复兴。无

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感性需求之所以如此普遍，就在于它回归人的感性生命，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和发展。

参考文献

杜超，2002年：《大学生网络情结的心理学思考》，载《中国青年报》3月3日。

马克思，1985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麦克卢汉，2000年：《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工作站）

责任编辑：黄慧珍（《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